

东北国际约章汇释

(1689—1919年)

步 平
张宗海

郭蕴深 编著
黄定天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目 次

编写说明	(1)
导言	(3)
约章目录	(27)
约章	(36)
附录	(613)
1 约章专题检索表	(613)
2 约章分国检索表	(623)
3 约章笔画检索表	(632)
4 引用及参考书目	(639)

编写说明

一、本书以反映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东北地区的侵略、掠夺和其间围绕该地区利权进行的国际竞争为目的，收录了自1689年至1919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期间直接涉及东北问题的有关交涉文件，包括以下内容：

1、各国政府间（包括中国政府）订立的直接涉及东北问题的条约及换文、照会。

2、中国东北地方政府与外国政府间订立的章程、合同。

3、中国中央政府或东北地方政府、企业、公司与外国企业、公司、私人间订立的有关章程、合同、契约、备忘录。

4、涉及东北重大问题的单方照会、声明。

以上收录各类内容中有相当部份不属国际条约之列，但因其充分反映了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与掠夺及其间的竞争，对研究东北地区的国际关系有重要意义，并能充分反映国际关系的多层次性，故一并收入。有部份约章只在个别条款中涉及东北问题，考虑到这些约章的重要性并为使其完整起见，仍收录了约章全文。

二、本书着重对国际约章订立的历史背景作简明叙述，对重要条款作必要注释，以此为线索说明围绕东北地区的复杂的国际关系及帝国主义的侵略活动。本书所收约章一般根据正式公布或经可靠书籍披露的文本，有些约章未找到合适的中文本或中文译本，则直接译自外文。因历史上各种因素的影响，条约的各种文本之间往往存在出入，被披露的文件有些在出版过程中存在讹误，

甚至讹传多年，约章订立时间也多有不确切者。本书对其中涉及重大问题之处，根据可靠资料，参照各种文本进行了改动，大部分加以说明。对中外文本之间在细节上的差异，一般不专门比较。部分约章中文原文无标点，本书引用时加以标点，有些参照了以往条约集的标点方法（参考书目列后），在重要地方参照了外文本，以求得尽量反映原意的目的。

个别约章因涉及问题过窄，本书保留约章名称，内容从略。

三、本书收录的约章按订立时间为序编排。各约章之前所作说明是以全书所有约章作为一个整体统筹安排编写的，避免了重复叙述。为了表明各约章及其说明之间的联系，书中除以见第××页的形式注明外，在附录中还特设约章专题检索表，读者可通过该表查到与各专题有关的约章，通过各约章说明可了解各有关专题事件的本末。为便于查找，书后还附有按国别和笔划编排的索引。

四、本书所收约章，一般以签字时间为订立时间，个别未找出者，以其他有关时间为订立时间。对原引参考书中时间有误者，凡能查到确实资料者，均加以订正。

五、约章范围颇宽，编者限于能力，未能全部找到，且对已收约章所作说明、注释也不尽完善。如有遗漏与错误，敬希读者指正。

导 言

中国的东北地区（简称东北），是近代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列强竞争角逐的重要战场，是它们争夺中国的一个焦点，因此被称为“亚洲的巴尔干”。世界上主要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国家，几乎都登上过这个政治舞台，演出过争夺霸权和攫取利益的丑剧。在东北发生的国际纠纷所涉及的范围及产生的影响，并非仅限于东北一隅。从广度上讲，在许多问题上它是帝国主义列强在中国、亚洲以至整个世界范围内矛盾的典型反映；从深度上讲，东北的国际交涉又大多与中国的命运有着生死攸关的联系。因此，研究帝国主义对东北的侵略和争夺，研究发生在这一地区的国际竞争和国际交涉，是研究中国近代史、东北地方史、中外关系史和远东国际关系史的一个重要环节。涉及东北的国际约章，在一定程度上集中地反映了发生在该地区的国际关系，成为研究这一地区国际关系的“突破口”。

本书收录的近代与东北有关的国际约章共164件（近代前涉及东北的3个中俄条约一并收入）。这些文件中，一部分属于国家之间就东北地区问题订立的条约或涉及东北地区问题的条约，还有一部分属于非条约性质的章程、合同、备忘录等文件。国家作为独立的政治单位，当然是国际政治舞台上的重要角色，但并不是唯一的角色。当时介入东北地区国际交涉的有国际组织（如四国银行团等），有外国设立在中国领土上的机构、企业（如中东铁路公司、“南满”铁路公司或五花八门的各煤矿、铁矿、木材公司），也有代表大公司的个人（如哈里曼等）。这些非国家角色参与的文件对研究这一时期的国际关系，反映国际关系的多层次性，有不可忽略的意义。这些文件既涉及到了政治、经济、军

事、文化诸方面，又体现了国际关系的多维性。书中对涉及重大问题的约章，均加以说明和注释。在此，仅将围绕这些约章订立有关的国际关系总背景，及帝国主义对东北利权争夺的基本情况，分3个时期进行概略介绍，力图从宏观的角度对这些看来联系不太紧密的约章加以分析，对其反映的国际关系进行总体说明。

一、中日甲午战争以前

中日甲午战争前，资本主义列强围绕东北利益进行的国际竞争，处于酝酿和萌发阶段。从表面看，这一时期有关中国东北的条约均为中国与相邻的俄国或朝鲜订立的。但是，十九世纪中叶西方资本主义相继侵入中国，中国的东北被它们圈入竞争的范围后，其间对该地区利益的争夺和斗争不可能在上述条约中毫无反映，否则，无法对此后的激烈竞争做出合乎逻辑的解释。

中俄之间在这个时期订立的约章有10个（包括近代前的3个）。主要涉及早期两国的边界划分与通商两大问题。

中俄东部边界的历史发展，可分为形成与变化两个阶段。边界的最初形成是长期处于封闭状态的中国统治者对边界的认识有了进步的标志，而这一过程集中反映在十七世纪末和十八世纪初中俄订立的三个边界条约中。这一批条约的订立不仅使两国东部边界得到确认，而且扼止了沙俄的继续扩张，使两国关系的稳定发展得到保证。因此，这一批条约在历史上所起的作用是不能忽视的。这些条约关于边界走向的规定，基本上反映了当时两国在该地传统的活动领域，即界限范围。当然，这些条约在确定边界具体位置时，无论在约文的表述上还是在实地标志上都不够精确，如陆路边界未会同勘定界标，水路边界也未对河中洲渚加以明确划分。其一方面是因为当时国家间签订条约还属于初期阶段，故条约在形式条件方面还不够完善；另一方面当时对土地及资源的要求和利用尚未达到“锱铢必较”的地步，即使是不够精

确的划分，也并未影响其后一百多年中条约对边界安宁的维护。但是到了十九世纪中期，俄国资本主义有了迅速发展，它不满足原有边界的限制，对具有特殊经济意义的领土（包括土地、河流）产生了贪得无厌的要求，这些条约才在俄国的武力威胁和外交压力下或完全、或部分地被否定。1858至1860年间订立的《璦琿和约》、《天津条约》和《续增条约》中关于边界问题的条款，基本否定了由《尼布楚条约》确定的中俄东部边界。这些条约反映的俄国在划界时对中国蛮横无礼的态度以及边界的重大变化、领土的大规模转移，都成为研究近代中外关系史的重要课题。此后，1861年的《勘分东界约记》和1886年的《琿春东界约》，则反映了俄国对中国领土的进一步蚕食和中国对领土主权有限度的捍卫，其中也反映了使边界精确化的努力。

中俄早期通商规模不大。《尼布楚条约》虽然确立了两国直接通商的原则，但长期闭关锁国的清政府对此并不热心，不仅禁止商人出境，甚至不准他们前往边境地区贸易。俄国商队虽然利用了这一机会经东北入境前往内地，^①在这一段时间里曾对脑温（今齐齐哈尔附近）昙花一现的贸易繁荣有过促进，但不久也就衰落了。至于两国在边境上的贸易，最初只有在格尔必齐河及墨里勒克等处进行过数量极为零星的交换，谈不上正式的贸易往来。《恰克图界约》签订后，定点贸易开始在恰克图、祖鲁海图两地明确起来，但两地情况大不相同。前者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里，左右了中俄贸易的基本趋势。后者却未发展起来。商人们因该地偏远而却步，终于使这一贸易地点被废弃。十九世纪中叶，俄国对华贸易受到来自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竞争，定点贸易出现衰落的趋势。俄国把利用黑龙江进行贸易视为改变被动局面的关键，从而成为引起这一时期一系列条约（《璦琿和约》、《天津条约》、《续增条约》）订立的主要原因。条约除对边界进行改变外，对两国贸易也有新的规定，主要是明确了边境贸易“百里不

纳税”的原则和扩大了陆路通商的范围。但是，条约签订后的相当长的时间里，俄国由于同新占据的地区交通联系不便和移民困难，未能充分利用条约的权利。正如有些西方学者注意到的，在十九世纪六、七十年代，黑龙江与其说是俄国扩张的交通线，不如说是俄国扩张的限制线。仅就中俄此时在东北地区的贸易来看，这一比喻是恰当的。一个很明显的例子是，《黑龙江通商条规》是由历来不大重视对商业贸易的清朝方面应俄国的要求提出的，可是迟迟得不到俄方的答复，以至《条规》始终未经双方正式签署。

早期中俄条约虽然主要反映中俄两国双边关系，但两国关系中也含有国际竞争的因素。

十九世纪中叶俄国改变中俄东部边界之前，美、英等国的势力虽未到达东北，但它们也已注意到了黑龙江地区的经济意义及战略地位。1848年美国最高法院顾问巴里麦尔曾建议美国政府取得在黑龙江及其支流航行的完全自由，希望美国企业主能掌握在黑龙江、松花江流域以及东北各口岸的贸易权。几年之后，美国人林郭尔德便实践这一计划，前来寻找黑龙江口并溯江上航。同时，柯林斯以美国商务代表名义自黑龙江泛舟而下，在庙街设立了他的办事处，还提出建筑西伯利亚大铁路以连接黑龙江航运的庞大设想。英国对黑龙江流域也极为重视。1848年，英国人希尔以学术考察为名穿越西伯利亚到恰克图、雅库茨克和鄂毕次克海，在伊尔库茨克逗留3个月。接着，英国人奥斯汀声称考察地质来到这里搜集了有关恰克图贸易的详细情报，又计划乘木筏沿黑龙江航行，为英国占领黑龙江口及库页岛进行预先侦察。当时俄国驻东西伯利亚总督穆拉维约夫担心他会把英国军舰引来控制中国东北，断然阻止奥斯汀的“探险”。可见，随着资本主义的长足发展和资本主义国家地位的巩固，各国间争夺新土地和市场的经济斗争、外交斗争和军事斗争日益激烈起来。俄国不过是利

用了与中国东北相毗连的优越的地理位置，抢在各列强之前捷足先登而已。美、英国虽然尚未在东北的国际竞争舞台上正式登场，但它们觊觎中国东北的野心已初见端倪，与俄国的矛盾、竞争势不可免。1854年起俄国船队屡次非法通过黑龙江，就是打着“前往东海”、“防堵英夷”的旗号。在逼迫中国签订《天津条约》、《续增条约》时，俄国虽然与侵略中国的英、法等国沆瀣一气，但在逼迫中国割地一事上却对英、法讳莫如深。这些现象表明，围绕黑龙江流域的问题，存在着复杂的国际竞争，只不过当时不甚尖锐和明显罢了。1892年中俄订立的《边界陆路电线相接条约》，便是国际间围绕经济利益竞争逐渐明显的标志。虽然这一竞争并不直接涉及东北的利益，但是可以看出，俄国在竞争中利用了与中国东北毗邻的特殊地理位置，在竞争中占了优势。这一得天独厚的条件，成为俄国最先称霸中国东北的重要因素之一。

中朝两国交涉是这一时期围绕东北利益国际间竞争的另一个侧面。

中日战争前，中朝间订立了3项章程，即《商民水陆贸易章程》及奉天、吉林两省分别与朝鲜订立的贸易章程。朝鲜对中国的关系，当时是具有臣属性质的外邦；有清以来，这种关系越来越明确。作为“属国”，只有“奉正朔，勤职贡”的义务，互相之间订立条约似乎是不可思议的。个中奥妙，只有联系当时的国际关系才能得出答案。十九世纪后半期，西方资本主义各国与日本、俄国同时注意到朝鲜。1876年到1884年间，日、英、美、德、法、俄相继逼迫朝鲜订立不平等条约，开始了对朝鲜利益的掠夺和瓜分。作为朝鲜宗主国的中国，尽管长期积贫积弱的实质尚未完全暴露，但已无力保护朝鲜不受列强的侵犯，只是本着“以夷制夷”的原则鼓励朝鲜与西方各国订约，“隐以备俄以抗日”。于是，“天朝大国”的尊严维持不下去了。朝鲜国内开始出

现要求实行政治改革的舆论，朝鲜政府也大胆向清政府提出互开口岸贸易、互派使节驻京的要求。名曰“分外人独占之利”，实则欲摆脱属国地位实现独立。这样，围绕朝鲜问题，出现了多种势力的对抗。中国也被卷到对朝鲜的政治、经济权利进行重新分配的复杂国际纠纷之中。中朝之间订立条约，便是受到列强纷纷与朝鲜订约的影响。当然，为了维护尚未完全崩溃的“天朝大国”的威望，为了强调与朝鲜的特殊关系，这些章程的序言都有“系中国优待属邦之意，不在与各国一体均沾之列”的声明。

从另一方面看，正因朝鲜与中国存在上述特殊关系，而其疆域又与东北相连，同奉天、吉林两省交往密切，所以东北与朝鲜在长期的国际交涉中往往被视为一体。即使是在中日甲午战后，中国虽完全退出了在朝鲜的争夺战，朝鲜沦为日本的殖民地，但日俄之间的争夺继续下来，不久又为此兵戎相见。在日俄争夺时期的政治地图上，东北与朝鲜仍是紧密联在一起的，国界几乎不起作用。至于到二十世纪上半叶，日本独占东北时，更制定了将二者作为一个整体的战略计划，东北仅是日本与苏联对峙的第一道防线。因此，将围绕朝鲜利益的国际竞争看作东北国际关系的一个组成部分，而且是必不可少的一部分，是完全必要的。

简而言之，十九世纪中叶以前的中俄条约反映了两国东部边界的历史沿革及商业贸易的某些问题，此后至1894年的中俄、中朝条约，则反映了当时隐而未发的国际竞争的因素。只是这时西方资本主义列强正忙于对中国沿海各地的侵略和掠夺，尚无更多的精力北顾。新崛起的日本也因羽毛未丰等原因未能全力以赴争夺东北。所以俄国虽凭借地理上的优势首先把势力扩张到东北，在短短的几年中，“从中国夺取了一块大小等于法德两国面积的领土和一条同多瑙河一样长的河流”^①，但东北的国际竞争仍属

^①恩格斯：《俄国在远东的成功》，《马恩选集》，第2卷，第37页。

萌芽状态。

二、中日战争后到日俄战争期间

十九世纪末期，正值世界范围内自由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转化的时期。帝国主义对殖民地、半殖民地的依赖性空前加强，占领殖民地、半殖民地斗争就带有拚命的性质。因此自1895年至1904年的十年中，帝国主义争夺东北的矛盾日益加深和激化，国际关系呈现出十分复杂的局面。本书所收录的这一时期的国际约章，较全面地反映了这些矛盾的发生和发展的过程。

这一时期围绕东北利益的国际竞争激化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俄国、日本两国影响的加强。英、法等老牌资本主义国家虽然早已侵入中国，但其经济扩张的重点依然在沿海、长江流域及华南地区。美国与德国利用技术进步的成果后来居上，与英、法等国的竞争也主要在上述地区，暂时未把主要力量放到东北。只有俄、日两国，恰恰在十九世纪末解决了国内影响资本主义发展的一些重大矛盾，加上其地理位置又与东北直接或间接相连，它们同时力于东北利权的争夺，这样便出现了俄、日两国共同左右东致北国际竞争的基本格局。

俄国取得黑龙江以北和乌苏里江以东的土地时，国内正在为废除农奴制度、开辟资本主义发展的道路而发生动荡。被资本主义的层层密网缠绕而又背着沉重的农奴制残余包袱的俄国，把发展的希望寄予对外的扩张和掠夺。但是，因为经济落后导致的内部虚弱，又使向新获得的土地移民的进程被迫放慢，使俄国无法及时消化这一地区。因此，在十九世纪的六十到八十年代，俄国暂时把主要的扩张目标放在距其中心较近的中亚和近东，在中国东北地区的活动一度减弱。但是，俄国在中亚和近东遭到了英国的顽强抵抗。英国竭力保护自己的“领地”，使俄国在巴尔干的争夺陷于失败，对于阿富汗、伊朗的兴趣也被迫转移，乃不得不

转到远东来。因此，当九十年代初俄国修建西伯利亚大铁路的经费准备就绪时^①，俄国政府便明确提出了关于俄国资本主义走向俄国以外远东广阔领土的问题，侵略矛头再次指向中国东北。但是，由于国内经济发展缓慢和在该地区一度放松扩张的影响，此时俄国在中国东北地区已面临严峻的局势，不象五、六十年代那样得心应手。英、德、美各国借营口开埠机会迅速北上，控制了东北的对外贸易，而俄国的商船在1889年前甚至没有到过营口。直到九十年代，俄国进入该港的商船总吨位仅占全部商船总吨位的1/500，贸易额远远低于英、美等国，面临无可奈何的落后局面。俄国显然不可能指望短期内在经济实力上超过对手，唯一的办法便是借助优越的地理位置，使用政治与军事的力量对东北实行直接控制。关于这一方针，俄国政府中许多决策人物都极力鼓吹。不过在实行控制的办法上，有的主张出兵东北，实施武装占领；有的主张改变中俄边界，把具有战略意义的地区划入俄国版图；也有的主张借助武装力量的威慑作用，对东北实行所谓“和平征服”。但无论采取何种方案，俄国都是东北的领土和经济利权的最主要觊觎者。当然，如果俄国只有英、美这些竞争对手，还有较充足的时间认真权衡各项主张的利弊，但是当日本帝国主义咄咄逼人的竞争来临时，俄国政府便不能那样从容不迫、按兵不动了。

日本帝国主义最富于对外侵略的性质是人所共知的。明治维新固然把它从封建的桎梏中解放出来，为资本主义的发展开辟了道路，但是，原料的缺乏，市场的萎缩，武士的失业、人口的相对过剩等等，都使日本的封建残余的包袱更加沉重。而统治阶级只抱怨岛国的狭小天地，自然把解除负担的注意力放到仅有“一衣带水”之隔的朝鲜和中国。

^①1891年8月，西伯利亚铁路东端在海参崴举行奠基礼。

如上述，俄、日两国同时注意到东北，势必剑拔弩张，双方的“拉锯战”便在东北的土地上展开。而俄国与法国在1894年结盟，日本又取得美、英的支持，使围绕东北利益的争夺具有复杂的国际背景，呈现出变幻多端的色彩和动荡不定的局面。当然，在这一时期的东北竞争中起主要作用的还是与东北毗连的俄国，在本书收入的该时期43项约章中，以俄国为缔约一方的就有33项之多。

如果对1895—1904年十年间俄国对东北的侵略活动为主线进行概略描述，可以说经历了从经济上、政治上的逐步扩张，发展到对东北全境的占领，再从全面占领被迫收缩这样一个由低到高，再由高到低的过程。因此，以1900年俄国占领东北为扩张的顶峰，该时期自然可以划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1894年—1900年，是俄国势力迅速进入东北地区并在此飞腾拔扈，划全境为势力范围的时期。这种咄咄逼人的进攻态势不仅严重损害了中国利益，而且引起了列强的不满，引出了这一时期围绕东北发生的国际关系的种种问题。这一阶段有关的约章22项，大部份以俄国为缔约一方。

这一阶段最引人注目的国际竞争事件是在中日甲午战争之后出现的“三国干涉还辽”。有关国家虽未就此直接订立约章，但是从《马关新约》到《辽南条约》的变化中，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干涉的后果。日本在甲午战争中拚出全力企图实现占领东北的愿望，却遭到视朝鲜与东北为自己势力范围的俄国的当头一棒。俄国先联络法国，又拉拢德国，在日本为获得辽东半岛而志得意满时发动了挑战。日本在军事战争中取得了胜利，却不得不承认“对三大国的联合干涉加以抵抗，可能是缺乏理智的行为”，因而在外交斗争中败下马来，不得不暂时承认俄国在东北的“霸主”地位而去“卧薪尝胆”。可以说，中日战争是帝国主义侵略东北的斗争尖锐化的开始，而“三国干涉还辽”则是列强在东北的第一次正面交锋。这一事件的结果奠定了这一阶段在东北发生

的国际关系的基本格局——俄国称霸东北。这样势必与刚在东北猎获到一块肥肉——辽东半岛，而又不得不吐出来的日本结下怨仇，自然为日后日、俄两国在该地的争夺伏下了杀机。

俄国出面干涉还辽，骗取了清朝政府的信任，被办理外交的李鸿章等大员看成是中国最可信赖的朋友，于是通过《御敌互相援助条约》为其在东北的扩张活动提供了充足的条件，俄国在财政、铁路和领土三方面迅速找到了控制东北的“突破口”。财政方面的“四厘借款”（通过《四厘借款合同》实现）并不是单纯的高利贷性质的金融借款，重要的问题在于俄国力图通过该借款及随后设立的华俄道胜银行（通过《银行合同》设立）控制中国的财政命脉与经济命脉，进而控制中国的政局。俄国财政大臣维特曾认为：“道胜银行不仅加强了俄国对华经济的影响，而且是掌握在俄国手中的为执行同西伯利亚大铁路有密切关系的措施的很有用的工具”，他得意地宣称：当时已没有别的国家能够在中国的财政事务面前取得支配地位了。围绕中东铁路的建设，俄国在此阶段迫使中国签订了《合办东省铁路公司合同》，制订了铁路公司及地方交涉总局的设立章程。俄国政府确信修建这条铁路是巩固其在东北地位的重要保证，因此不顾将铁路建在国外会在管理上势必产生的冲突甚至引起军事行动的危险。当时俄国政府中有些人为此惴惴不安，认为这是犯了一个很大的历史错误。但是，俄国为了达到称霸东北的目的，而甘愿承受战争风险。因为，阻止列强在东北修筑任何铁路的目的一旦达到，控制东北的局面便初步形成了。而俄国通过一系列租地条约对旅大及辽东半岛部分地区的强占，便使其在东北的地区位得到了充分的加强。凭借这样的优势，俄国决心摘取东北地区列强霸主的“桂冠”。

但是，从国际关系上看，俄国在上述三个方面的侵略活动，又是帝国主义列强对东北以及全中国进行更大规模侵略的导火线，也是其间矛盾加深和激化的“催化剂”。俄法“四厘借

款”开帝国主义各国金融资本对中国进行侵略性政治借款的先河后，英、德的“五厘借款”和“四厘半借款”便在竞争中接踵而来，庞大的外债加在中国人民头上，使中国长期陷在债务中不能自拔。中东铁路的修建，则使帝国主义争夺在华铁路投资权利的斗争明显地尖锐起来。英、美、法、德、比、意、日等国都加入到竞争的行列，其间的矛盾在争夺芦汉、津镇、粤汉、京奉（关内外）四条铁路的投资修筑权上尤为激烈。英国对修筑京奉路的“热心”，便是出于对俄国支持的比利时财团投资芦汉路的担心，也是对俄国独占东北的挑战。中、英之间关于关内外铁路借款的谈判过程，反映了英、俄之间的矛盾与争夺。两国不仅都向中国施加压力，而且直接交手，斗争十分尖锐。虽然中、英借款成立，但英、俄竞争未了。直到两国当面交涉就各自铁路投资范围，亦即政治势力范围达成协议，以互换照会形式加以明确，竞争才暂告缓和。不久，俄国又逼迫中国清政府就北京以北建造铁路问题作出许诺，华北地区也被部份地划到了俄国铁路投资的范围之中。

在围绕东北的铁路投资的竞争中，美国也是一支不可忽略的力量。1895年，即《中俄密约》订立前一年，美国便提出修建纵贯中国的铁路的计划。其中东北部份，计划从西伯利亚铁路上的一站起，经齐齐哈尔、沈阳至北京。美国公开宣称：目的是“把中国从俄国人的入侵中解放出来”。虽然《中俄密约》的签订使这一计划暂时被搁置，但来自美国的挑战却不容忽视。日俄战争后美国对俄国在东北利益上的一再冲击，是这一事件的继续发展。俄国占领旅大，也是具有国际影响的事件。其实，俄国早已暗中支持德国占领胶州湾，为此与其进行了一笔政治交易，①从而实现了占领辽东半岛的企图。两国的狼狈为奸，又在列强中引起

①1897年8月，德皇威廉二世访俄，沙皇表示同意德国占领胶州湾，此后，俄国要求占旅大作为补偿，德国也不反对。

轩然大波，竞相取得在中国利益上的补偿。于是，一场瓜分中国的狂潮出现了：英国强租威海卫，扩大了香港租界址；法国租借广州湾，势力深入云南、两广；日本要求对福建拥有特殊权利；美国则提出著名的“门户开放”政策。如果说1899—1900年的世界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疯狂扩大殖民地的基本原因的话，那么，俄国对东北的扩张就是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狂潮的前奏。

俄国以咄咄逼人的姿态出现在东北，短短几年里取得了令列强瞠目结舌的进展，引起了多数列强的妒心，出现了列强联盟抵制俄国的趋势。到1900年，俄国出兵占领东北，成功地抵制了其他列强进入东北的企图，以压倒的优势形成了独霸东北的局面。然而，物极必反，潜在的危机从此爆发，这时也是俄国在东北的势力从颠峰跌落的开始。

第二阶段，1900年至1904年，是日本与俄国围绕东北利益的争夺逐渐尖锐并激化，而俄国的影响开始走下坡路的时期。俄国在参加了1900年列强联合进攻中国的行动之后，不仅要求获得最多的报酬，即分占最多的赃物，而且乘机出兵占领了东北，并准备在此建立直接的政治与经济的保护关系。这样，终于使不同程度被排斥在东北之外的列强们联合起来，找到了向俄国进攻的最好机会，于是出现了列强集团化的趋势。就所收这一阶段约章的数量来说，21项中有17项与俄国有关。但是，同上一阶段相比，这17项约章所涉及的领域已经大大缩小，大部份约章局限于东北地方经济问题；在层次上也多降为非政府的各机构间订立的章程。国家间签订的《交收东三省条约》和《交还关外铁路条约》，则是俄国被迫屈服于列强的联合干涉的结果，证明俄国在东北扩张活动越来越明显地遭到中国的反抗和来自列强的抵制，被迫缩小活动范围。

列强对于俄国在中国东北的活动虽然早已产生忌妒和不满，但在1900年前俄国还仅限于经济方面的扩张，而其他主要列强在

势力范围、铁路投资以及租界等方面又相应得到了补偿，故其间的矛盾尚未激化，还维护着表面上的平衡，尽管这种平衡极其脆弱。但是，俄国出兵并占据东北，对平衡局面的冲击极为严重，矛盾终于爆发了。俄国军队占领开放港口营口，引起了列强一连串的外交抗议^①；俄军控制北京通往东北的铁路，触动了英国的极为敏感的神经，出现了争夺山海关的戏剧性事件，俄国将在天津白河以东的军队驻地改为租界，又在列强间引起了轩然大波。一系列事件使俄国成为众矢之的，而俄国逼迫东北地方官员订立的《奉天交地暂且章程》一公开，顿时成为溅落在干柴上的火星。英国外交大臣意识到俄国在东北的活动将“使其他列强在华北伸展势力的希望也丧失了”，因此积极活动，竭力联合日本、德国，共同干涉俄国。美国国务卿指责俄国“危害了美国在华的工商利益”，也参加到英国一方来。这时，帝国主义虽然在镇压中国人民的反帝爱国起义时结成统一战线，但它们围绕在华利益而产生的矛盾却没有得到缓和。获得在华利益最多的俄国终于被孤立了，其中，以英、日两国结成的反俄同盟阵容威胁最大，而且这一同盟还有美国的支持。迫于树敌太多的严峻形势，俄国不敢再象以往那样锋芒毕露，不得不稍作收敛，当然，根本利益是不肯放弃的。因此，俄国在参加列强行列共同逼迫中国签订条约的同时，竭力掩饰与中国单独订立条约的意图和举动，把主要力量放到攫取东北的资源上。在东北，俄国也尽量把政府的活动掩饰起来，而以道胜银行、中东铁路公司或私人公司出面。这些公司趁东北局势不稳之机，分别同各省将军及私人公司订立合同或章程，迫不及待地猎取开发东北金矿、煤矿、木材等资源和占有土地（以铁路用地为名）的特权。这些约章多产生于混乱的局面之

^① 俄军占领营口之时，降下海关旗帜代之以俄国国旗，并规定将海关收入存入道胜银行，引起列强不满。